

毛泽东交往实录丛书

于云鹏桂仁主编



毛泽东与同事(1)

俞清天等著

毛泽东与同事(1)

俞清天等著

毛泽东交往实录丛书

于云鹏桂仁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6 号

毛泽东交往实录丛书

千云鹏 桂仁 主编

毛泽东与同事(1、2)

俞清天 等 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

印刷者:建工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440000

印 张:17.75 插页 2

版 次:199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1-20000

书 号:ISBN7-300-01450-x/G·15·

定 价:12.80 元

编 者 的 话

“毛泽东交往实录丛书”通过记述毛泽东与同事、亲友及各类人士的交往，从某些侧面再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烘托出毛泽东的思想、精神、个性及生活情况。从国家事、天下事到生活中的细微琐事，个中人物、故事感人肺腑，发人深思，增广见闻。

丛书共8册，包括：《毛泽东与同事》（1、2）、《毛泽东与专家学者》、《毛泽东与亲眷》、《毛泽东与党外人士》、《毛泽东与国际人士》、《国外毛泽东生平传记荟萃》（1、2）。丛书由有关专家学者依据真确可靠的资料编写而成。

目 录

一	风雨同舟，生死与共	
	——毛泽东与周恩来	1
二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毛泽东与刘少奇	54
三	“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	
	——毛泽东与朱德	78
四	真理的纽带	
	——毛泽东与张闻天	112
五	“吕端大事不糊涂”	
	——毛泽东与叶剑英	138
六	“谁敢横枪勒马，惟我彭大将军”	
	——毛泽东与彭德怀	163
七	“陈毅是个好同志”	
	——毛泽东与陈毅	200
八	“记得当年草上飞”	
	——毛泽东与罗荣桓	217
九	投下了关键性的一票	
	——毛泽东与王稼祥	239

十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毛泽东与蔡和森	263
十一	峥嵘岁月稠 ——毛泽东与何叔衡	296
十二	“他是理论界的鲁迅” ——毛泽东与李达	311
十三	毛泽东麾前的“老兵” ——毛泽东与何长工	343
十四	求同辨异，相待以诚 ——毛泽东与李立三	373
十五	“为全体军民服务” ——毛泽东与傅连璋	388
十六	播火潇湘痛失柳 ——毛泽东与柳直荀	413
十七	“秀才还是我们的” ——毛泽东与田家英	426
十八	开拓与分歧 ——毛泽东与陈独秀	439
十九	“折戟沉沙铁未销” ——毛泽东与林彪	456
二十	“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毛泽东与陈伯达	482
二十一	历史的沉思 ——毛泽东与康生	508
二十二	历史的玩笑 ——毛泽东与王洪文	537
	参考书目	555
	后 记	559

—— 风雨同舟，生死与共

——毛泽东与周恩来

(一)

广州3月，春意融融，繁花似锦。1924年国共两党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成立后，革命形势似大海的波涛一浪一浪地向前发展。但是向前发展的革命浪潮突然卷起了逆流，人们心头有如袭进一股寒流，脸上浮起了莫明的惊恐。在20日那一天，广州紧急戒严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被解除了，苏联领事馆被包围，苏联顾问被监视……。蒋介石一手策划了反革命阴谋活动。

蒋介石是一个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反革命两面派，在一定时期内他曾表面上赞成联俄容共，但在革命群众运动日益向前发展时，他就加紧了他的反共步伐。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声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到黄埔后，蒋介石却无中生有地说，共产党人私调中山舰要劫持他离开广东。蒋以此为由逮捕了李之龙，采取了一系列严重的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反共行动。这就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

蒋介石反共是他的本性决定的。面对气势汹汹，咄咄逼人的

反共事件，共产党人应该如何作出正确的分析，采取何种正确的态度呢？毛泽东、周恩来在处理中山舰事件中的立场和态度是基本相同的。我们不能说这两位著名共产党员人在此之前未曾相识。但我们却能肯定相信，在处理“中山舰事件”中，他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交往。

周恩来，1898年生于江苏淮安，原籍浙江绍兴。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1919年回国，在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和其他同志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夏，经中国共产党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4年秋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一师党代表、广东区党委军事部长。“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到区党委，与聂荣臻，陈延年等一起议论。他们都非常气愤，主张给蒋介石以反击。周恩来说，蒋介石2月份驱逐一名左派师长之事，就有反共苗头。他曾向组织报告过，但没有引起重视。现在的情况是，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其他5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介石。而在第一军的3个师中，有2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我们占了7个。营以下各级军官中不少是共产党人。整个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第一军又是黄埔军校教导团的底子，党的传统影响很大，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的。作出上述分析后，周恩来主张，以我们的“三·二〇”反击蒋介石的“三·二〇”。

在国民党内部主张反击的空气也很浓，黄埔军校学生在校贴出反对逮捕共产党员的抗议书，并联络各方面革命势力准备上街示威。周恩来的分析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反击也是切实可行的。当

时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则建议到粤桂边界组织农民武装进行反击，在对待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右派争夺领导权的严重事件中，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是一致的。其实，蒋介石当时羽翼未丰，这次行动又多少带有试探的性质。他在采取行动后，很快又释放被捕人员，发还所缴枪支，表示这次事件是一种“误会”，“自请从严处分”。对此，如能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进行坚决反击，是能够成功的，那就可能除去统一战线中一大隐患。但是陈独秀却被蒋介石气势汹汹的行动所吓倒，继续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不但使蒋介石篡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全部军权，而且更加鼓励了蒋介石放心大胆地进一步采取限制共产党的活动。

在大革命时期，对待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的态度，是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斗争的焦点。1926年，毛泽东亲自在广州主办第6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党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为全国农民运动大发展奠定了基础。1926年5月，周恩来应邀讲授《军事运动和农民运动》，运用具体生动的事例，充分论证没有农民运动和革命武装就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相互关系。周恩来那年青英俊的形象和生动活泼的讲演，给学员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两位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创立了丰功伟绩的战友，相识于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时期，开始了他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友谊。

(二)

如果说在大革命时期，在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毛泽东、周恩来在处理“中山舰事件”的立场和态度基本一致的话，那么在大革命失败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上，他们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走着一条艰辛的不平坦的道路。周恩来在三届一中全会上就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国共合作行

将全面破裂的时候，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他就任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国共全面分裂后，他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一起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诞生。遗憾的是这支共产党领导的起义部队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结果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终于失败了。

客观地说，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只有过参加北伐战争那种以占领重要城市为目标的正规军作战的经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不曾有过先夺取农村的先例。人们总是容易根据自己原有的经验来处理新遇到的问题，出现这种遗憾也是幼年的共产党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南昌起义没有解决的问题，却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解决了。

毛泽东参加“八·七”会议并执行“八·七”会议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正确方针。会后，他作为中央特派员领导湖南秋收起义。根据会议精神，起义的最初目标仍在于夺取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善于从实际出发的毛泽东表现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杰出才能。当他见到各路起义军先后遭受严重挫折，夺取长沙的目标无法实现时，他便当机立断地改变原有部署，说服了坚持攻打长沙的人，率领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经过了艰难曲折的斗争，10月7日到达了井冈山北麓的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党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究竟该怎么搞，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需要在斗争中不断探索，这就难免遇到挫折。南昌起义开始时占领了南昌城，但南下广东后就失败了。秋收起义开始时连遭挫折，但是挫折中总结教训，成功地找到了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两位战友彼此肯定，互

相推崇，都给对方以很高的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周恩来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因为自己没有将南昌起义部队引向农村而多次进行自我批评，同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将秋收起义部队引上井冈山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则多次赞扬了南昌起义的巨大功绩，指示军旗要有“八·一”两字。两位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立下丰碑的战友表现了何等博大坦荡的胸怀！

1928年，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六大以后，周恩来回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实际上他是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在此期间，他逐步认识了毛泽东领导武装斗争的军事思想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给坚持井冈山斗争的毛泽东以有力的支持。1929年，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领导者之间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6月，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未能得到完全解决。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红四军七大未能就这些问题统一认识。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改选时只被选为前委委员，没有被选为前委书记，于是，毛泽东离开了前委领导岗位。

作为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得知此情况后，在8月21日代表中央起草了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对红四军七大提出了批评，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9月，周恩来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军事会议，听取了来自井冈山的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汇报。并且同陈毅作了多次的谈话，宣布了中央关于毛泽东回红四军继续担任党的前委书记的决定。

会后，要陈毅按照他的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为起草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指示信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1）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

立苏维埃政权；(2) 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3) 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并且分析了红四军党内的实际情况，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能使之减少农民意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所以有战斗力，在于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性是由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作保证的。指示信强调应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样，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议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论。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对于恢复并巩固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领导地位起了重大的作用。在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指引下，一个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产生了。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举行。会议总结了经验，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人民的军队。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其中重要的部分。这个不朽的文献凝结着毛泽东、周恩来的心血，提出了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环境以及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条件下，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原则和措施。

（三）

如果说20年代下半期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关系已有定论的话，那么30年代前期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关系却是人们议论的一个焦点。因为在“左”倾教条主义取得在中央领导权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周恩来就一直是中央重要领导人之一。就是在“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继任这一职务的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因

为这个事实，历史上议论纷纷，认为周恩来“狠整”了毛泽东并夺了毛泽东的军权，以至于历史面目被弄得扑朔迷离、难分真假。既然谈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绕过这样一个问题不行，轻描淡写这一问题也不行。必须揭开历史的迷雾，还事实以真相。

宁都会议是在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的一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当时苏区中央局因工作关系分成两个部分：在前方指挥作战的称“前方中央局领导”，在后方领导工作的称“后方中央局领导”。这次会议是为了解决前后方关于作战指导方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是贯彻“左”倾中央提出的“积极进攻”路线呢，还是按照毛泽东等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作战方针行动呢？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而其斗争的矛头是指向毛泽东。

宁都会议上，毛泽东据理力争，公开批评了中央局在后方的负责人的错误的军事路线，这更令后方中央局成员无法忍受，因而集中火力对毛泽东进行了“无情的打击”。会议对毛泽东领导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实行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对于毛泽东反对急于进攻中心城市战略方针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消极怠工”。当时中央局的书记是周恩来，有人就想当然地认为周恩来不但亲自主持这次会议，而且也是坚决反毛泽东的一员。其实关于在宁都会议上要“斗争”毛泽东，及要撤毛泽东的职，调毛泽东回后方等，这些内容，在后方中央局成员会前均未与周恩来商量，而是在会上突然提出来的。那么周恩来对待毛泽东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可以肯定地说，周恩来与朱德、王稼祥一起维护了毛泽东。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态度是鲜明的。会上，后方中央局领导提出“由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周恩来明确表示不同意，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如果由他负主持战争责任，毛泽东必须在“前方助理”；二是由毛泽东“负主持战争责

任”，他“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显然，周恩来是坚持让毛泽东必须留在指挥红军战争的领导岗位上。为此，周恩来本人也受到后方中央局领导的责难，认为周恩来也不赞成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没有站在坚定的立场集中火力反对”毛泽东的“错误”，“不给毛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错误”，甚至给周恩来扣上了“调和主义”的帽子，说他“在斗争中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开展了的斗争战线”。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关于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及其杰出的指挥才能极为欣赏，即使被指责为“右倾”、“调和”也在所不顾。虽然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在会上据理力争，也未能挽回局面，毛泽东被调离前线，随即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也被撤销，由周恩来兼任。但周恩来却力争毛泽东重返前线，指挥作战。直至10月在制定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役计划》上仍签上“红军总政委毛泽东”，周恩来本人以“代总政委”名义副署。宁都会议结束后，他骑马给回后方的毛泽东送行。毛泽东病了，他又策马去瑞金东华山探望。在制订“绝密”的战役计划的封面上，他亲笔注明：“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表明了他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尊重。这一切是出自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出自对被战争实践检验为正确的战略战术的信赖。这在周恩来亲自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得到了明证。

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了30多个师，分3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以陈诚指挥的12个师约16万人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动出击，迅速攻占敌人重兵把守、工事坚固的南丰和南城。周恩来、朱德等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地执行苏区中央局的命令，仍然按照毛泽东规定的内线作战原则，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毅然采取退却的步骤，迅速将主力秘密转移，待机歼敌，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红军战争

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称赞这次战役是一次“大胜仗”。在延安，毛泽东还对埃德加·斯诺说过，南京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蒋介石给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的“手谕”中则说：周恩来确是一个不易应付的对手。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这次胜利，正是周恩来、朱德杰出指挥的胜利，也是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战略战术的胜利。

（四）

由于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对毛泽东的支持和辩护，也由于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没有执行冒险进攻中心城市的方针，对后方中央局和博古进行了多次的抗争，这就引起了“左”倾领导的不满。特别是1933年10月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来到根据地，周恩来的观点当然不能使李德满意，就在这年底被调离前方，回到瑞金，负责领导一些技术性的组织工作，失去了军事指挥权。在1933年下半年的第五次反“围剿”中，不懂军事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而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及其规律。实际上成为这次战争的最高军事指挥者的李德和博古，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等错误口号，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方针。在进攻遭受挫折后，他们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拼消耗，结果红军损失惨重，根据地日渐缩小，打破国民党的第五“围剿”的希望最后断绝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转移。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实行突围和转移中又犯

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的错误。当部队突破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损失惨重，由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左”倾领导的错误，几乎将中央红军推向了绝境。大的挫折呼唤着大的转折，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就在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召开了。

历史已经作出结论，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因为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的实现是党的健康力量集体奋斗的结果。毛泽东以其正确的军事战略思想赢得了持正确路线同志的支持。实践的教训也使曾经卷入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转向正确的立场。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性的一票而立了一大功劳。张闻天的作用同样功不可没。而周恩来对于促进遵义会议的召开及其胜利，起了不可取代的决定性的作用。

1932年博古、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后，随即组成了代表党中央处理一切的“三人团”，实际上是拥有党中央最高权力的领导核心。周恩来与博古、李德同为“三人团”成员。从党内地位来说，周恩来是仅次于博古的中央领导人。在“三人团”中，周恩来是在博古、李德的领导下，做“领导核心”的管事工作，成为“三人团”的“管事成员”。虽然周恩来是执行者，而且也不完全同意博、李的决定，并且与博、李也有一定的斗争，但毕竟是“领导核心”的成员，对于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而被迫长征，当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但是周恩来一旦通过实践，认识了“左”倾的错误，就能与博古、李德的错误划清界限，断然从“三人团”中分裂出来，这为遵义会议圆满完成伟大历史转折的任务，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周恩来在行动上从老山界开始就站在毛泽东方面。在队伍进入通道地域后，在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中央放弃原定战略方向，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在通道，

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研究这一重大的战略决策时，周恩来公开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但遭到李德、博古的坚决反对。为了维护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团结，政治局多数同志只同意毛泽东关于西入贵州的意见，其他问题留待以后再议。这就是长征途中著名的“通道转兵”。周恩来公开与李德、博古的错误分裂，不但开始纠正了“三人团”“处理一切”的不正常局面，逐步恢复中央政治局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而且也影响其他同志转向毛泽东一边。在通道召开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的态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央红军西入贵州，暂时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但蒋介石又急调重兵，在红军行进的前方布下罗网，设下埋伏。为了摆脱困境，于1934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黎平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通道会议上未能解决的战略方针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同李德、博古展开了一场尤为激烈的争论。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放弃了原订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湘西的计划，改向黔北挺进。会议还决定恢复过去毛泽东的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原则。李德因为争论失败而大发脾气。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召开遵义扩大会议的决定。

虽然有了通道、黎平会议，但仍然掌握军事指挥大权的李德、博古一意孤行，置政治局决议于不顾，还要“处理一切”。他们企图分散红军主力，沿乌江右岸打游击去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果真如此，红军有被敌军打散的危险。于是就有了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的召开。在周恩来主持下，会议批评了李德、博古的意见，重申了黎平会议的正确方针。会议明确规定，“三人团”取代军委所作出的“作战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汇报。这样就从组织上开始纠正中央红军在李德荒谬指挥下被消灭的危险，开始恢复了党领导军队的正常的状态。此后，就不再让李德、博古指挥作战了。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起了关键性的核心作用。